

CHANGES BROUGHT BY MACRO-ECONOMIC CONTROL

30年调控改变生活



——《财富生活》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魏加宁

■文：本刊记者 郭婷婷

带着对改革开放30年的敬意
去做一次拜访
而不是采访

1978年，要不要改革开放，关系到占世界1/5人口的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还是贫困没落之大事。如今，实施改革开放整整30年。30年间，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此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变化在历史和世界上都鲜有出现。这就是党和人民，为什么在30年前毅然决然地选择改革开放，坚持了30年之久，并且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的主要原因。

●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洋跃进”到经济调整

EL: 1976年由于粉碎了“四人帮”，民心大振，抓生产重新名正言顺，短时间内，国民经济便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但刚刚恢复过来的国民经济又受到了新的冲击，经济过热的征兆很快凸显出来。针对这一特定背景，做出了哪些调整？

魏加宁: 这一时期的转折点出现在1979年初。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再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在之后不久的理论务虚会上讲话，他再次肯定了调整方针。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狠批了“洋跃进”。政治局会议同意国家计委修改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决定用3年的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在同年的中央工作会会上，李先念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报告，会议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的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即“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EL: 尽管这次经济过热问题发现得比较早，但由于从发现问题到统一认识，再到政策制订、具体实施会存在一定的时滞，经济过热的势头还是发展了一段时间，这次经济过热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魏加宁: 在紧缩效果不够理想的情况下，国务院于1981年1月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信贷管理 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在政策措施的作用下，通货膨胀率终于于1981年开始下降，并于1983年初达到谷底，对外贸易也由赤字转为盈余。

这次经济过热的根本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上，在紧缩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得到强化，因此只能说是“计划调整”，还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宏观调控。

●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波动中探索

EL: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会议上，明确了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中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到了1984年上半年，三年调整的任务已经接近完成，农村改革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扭转了计划经济思想的回潮，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性质、任务和方针政策。人心振奋，可以说，改革和发展进入了新的高潮。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是什么决定了这一时期的调整思路？

魏加宁：在当时中央领导的鼓励下，各地开始为“翻两番”而“大干快上”，经济过热的苗头随之再次显现。

从1985年上半年，国务院连续召开了3次省长会议，要求严格控制信贷和工资奖金的发放，实行财政、信贷双紧政策。虽然会议提出的措施十分正确也比较及时，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和利益上的制

肘，具体措施一时难以落实，1985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还是出现了“超高速”增长。同年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党代表会议上，邓小平指出：“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会后，国务院进一步加强了信贷紧缩力度，到第4季度，信贷失控状态基本上扭转过来，与此同时，工业生产增长速度降至10.2%。

但到了1986年第1季度，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开始显著下降：第1季度与上年同期比只增长了4.4%；2月份甚至出现GDP的零增长。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从1986年第2季度起，中央银行便重新开始大幅度放松货币信贷投放，经济尚未“软着陆”却又“硬起飞”。

1988年的“中央1号文件”，一改历年以农业为主题的惯例，专讲宏观经济问题，并指出，1987年实现了有效益的增长，速度高而无通货膨胀的危险。1988年

5月上旬，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此后五年中实现价格和工资改革“闯关”。此时，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从农产品开始的涨价风正在向其他领域扩散，储蓄也出现了负增长，这表明通货膨胀预期正在形成，应“先治理，再闯关”。1988年下半年，事态果然朝着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担心的方向发展：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同比攀升至26%，城市出现商品抢购风潮、倒买倒卖计划分配物资和外汇额度等不良现象，使改革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EL:本轮宏观调控同上一轮的明显不同是什么？

魏加宁：经济学界一般将1984年的经济过热和1988年的经济过热分为两个不同的经济周期，但是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将两个周期合并起来一起分析似乎更完整，更能说明此轮宏观调控摇摆不定，致使经济运行尚未实现“软着陆”就又“硬起飞”，最终导致“硬着陆”。

●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从经济过热到“软着陆”

EL:请带我们回顾一下，为尽快实现“软着陆”，采取了哪些措施？成效如何？

魏加宁：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起到了巨大的刺激效应。从1992年第2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迅速升温。为更好地发展经济，中央先后数次派遣调查组分赴各地进行调研，发布了《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16条措施。

措施出台以后，经济过热压力开始得到缓解。实行紧缩措施以后，国内需求明显收缩，但是出口需求非常旺盛，同时有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内，但由于当年粮食减产，粮价上涨50.7%。

为此，政府进一步强化了行政手段对粮食价格的直接控制，接连对粮食零售价格实行限价、对20种生活必需品实行严格的价格审核。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1994年年初，中共中央把“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确定为当年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及时出台财税、金融、外汇等一系列的宏观配套改革措施。在宏观调控和配套改革措施的双重作用下，经济运行良好。

EL:这一轮宏观调控的特点是什么？

魏加宁：这一轮宏观调控是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之后的第一次宏观调控，因此在调控手段上有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调控的重心在人民银行，调控的手段偏重于货币金融政策，调控的特色体现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还出台了一系列宏观配套改革措施，从而使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

● 20世纪90年代后期—21世纪初：从应对危机到新一轮宏观调控

EL:1997年7月1日，亚洲金融危机从泰国开始爆发，当时人民币面临着巨大的贬值压力。为稳定市场信心，我们做出了许多努力，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的经验和启示对后来的调控具有怎样的意义？

魏加宁：危机爆发后，对外公开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外汇管理体制改中所确立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无形之中被“固定”了下来，这意味着我国的外贸出口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1998年，中央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包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每年增发1000亿元国债，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同年底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长速度指标不应当是指令性的、计划性的，而应当是指导性的、预期性的，应当能够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进行调整。此后，不再硬性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改革方面，如国企改革、住房体制改革以及国有银行改革。

从2001年起，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期。到2004年春，投资增长过快的现象非常明显，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控制投资过快增长，同时要严格控制信贷和土地，这一时期启动了“地根调控”。

200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两年在10%以上，积极的财政政策终于开始淡出，国债规模减少。此外，议论已久的汇率改革也终于出台，但房地产价格依然继续攀升。

2006年，除了房地产价格，股市价格也开始出现暴涨，环境问题也更加凸显。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以特急件形式联合下发《关于印发新开工项目清理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遏止上述问题。

2007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强劲的快速增长势头，经济运行总体形势保持基本稳定。农业生产总体呈稳定增长态势，工业企业利润明显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有较大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出口增长依然强劲。但仍然存在经济增长速度过快、贸易顺差过大、货币供给过多、投资增长速度过高、居民消费价格抬头过猛、资产价格上涨过快等“六过”现象。200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随即提出：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变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变为全面通货膨胀。

EL:2008年是改革开放的第30年，这30年也是中国人有史以来生活得最好的30年。可是，有迹象显现，2008年的宏观经济走势很不确定，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魏加宁：是的，2008年是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不确定性最强、预测难度最大、政策选择最难的一个时期。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国内的通货膨胀已经通过前两年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和配套改革压下去了，当时的政策取向是单方向的：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把经济往上推。而如今，我们面临的风险则是双方向的：国内是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国外是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内热外冷。因此，政策选择处于两难境地，政策力度难以把握。这一轮的宏观调控，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已经确立”的背景下进行的。目前，本轮调控已持续多年，仍在继续，成效有待现实考证。 **EL**

[责任编辑：郭婷婷]